

作为国学大家和教育家，张岂之手不释卷，至今仍每天坚持读书、看新闻。他住在清华园的一所老居民楼里，尽管80多岁了，但衣饰向来整洁，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。他身材高大清瘦，举止优雅，令人见之忘俗。

他最近在看《朗润琐言：季羨林学术思想精粹》并做笔记，每次出去开会都看一点，觉得好的都划了重点号。以有涯人生做无涯探究，张岂之乐在其中。

当代英杰

张岂之 乐在文化传承

张炜煜 吴爽



影响深远的几位老师

张岂之生于1927年。少年时，由于战乱，张岂之就读的学校一再变动。在江苏南通读的小学，在甘肃兰州读了初一、初二，再到陕南城固读初三，后来又到重庆，就读于南开高中。

1946年北大、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和天津复校，并于次年联合招生，张岂之报考了北大哲学系。他还清晰地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《学校与社会》，作文中强调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，得了很高的分数；他也不偏科，数学考了60多分，以正取生的身份被录取。

汤用彤先生当年任文学院院长，开出了魏晋玄学、英国经验主义、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。汤先生想让学生知道，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。这种教学方法让张岂之受益终生。张岂之当年听了前三门课并做了详尽的课堂笔记。汤先生不仅看过这些笔记，甚至还亲笔修正了里面的错讹。这些笔记如果现在还在，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。

让张岂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。在“英国经验主义”课堂上，汤用彤先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：洛克如何用经验主义修改了笛卡尔的知识学说？张岂之认真阅读了原文，很快写出了读书笔记，但汤先生认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，即没有注明笛卡尔能够贯彻其知识论的起点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青年张岂之辩护道：这些我懂，别人也都懂，所以没必要写出来。”汤先生的教育风格就是娓娓道来。他轻轻地讲：要从学生时期养成好习惯，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，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，要处处考虑读者。文章中重要的环节即众所周知，也不能省略。

贺麟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有效。那时候他开的是“黑格尔哲学”选修课。1948年选读该课的共有5名学

生，贺麟先生译出了中文本《小逻辑》，让学生根据原著对中文本“加以校正”或提出问题。其他4人据德文版，张岂之据英文版。平常自学，每周去贺麟先生家里听一次课，大家常常能发生争论。这种教学方法特别有启发性，5人之一的杨祖陶就是这样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。后来，贺麟先生在《小逻辑》译本（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）“引言”中说：1946至1950这一学年内，我在北京大学授“黑格尔哲学”一科，班上有杨宪邦、张岂之、杨祖陶、陈世夫、梅得愚诸同学，并有王太庆、徐家昌二同志参加。上学期我们研读《小逻辑》，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《黑格尔〈逻辑学〉一书摘要》，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，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，作有读书报告。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，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张岂之求学积极主动。有个学期，讲师齐良骥开的选修课《英文哲学名著选读》只有张岂之一个学生选读，但系里并没有因此停开这门课，齐先生也没有提其他要求。课后齐先生还递给他一张纸条，问自己讲课的不足之处。后来的石峻先生讲课风格不同于齐良骥先生，他热情奔放，随时挥洒，听得人天宽地阔。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湖南乡音较重，语速较快，有些地方学生听不明白。于是张岂之就把听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归纳出来，写短信给石先生请求点拨。石先生有时便留书给张岂之，纸条上会提示阅读时注意哪些问题。他还主动问张岂之需要哪些书，并带他到自己堆满了图书的宿舍让他挑选。张岂之借书后写借条，石先生不要，说你用后还我就是了。师生间这份宝贵的情谊迄今让张岂之感念不已。



一向重视高校教学

1950年，张岂之从北大毕业。毕业以后有两个途径：一是工作，二是继续读书。任继愈先生建议张岂之继续读清华哲学系研究生。任先生还让张岂之星期天去见他：“我带你到清华看看，环境很好，学术气氛也不错。”张岂之一度担心自己考不上，任先生鼓励他好好准备。当年清华大学招了24名研究生，哲学系有3个名额，其中就有张岂之。

随后有消息传出：清华不办文科了，都并到北大去。这让文科学生惶恐不安。好在柳暗花明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张岂之的另外一个老师、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派人来找他。1948年张岂之听过他的《中国思想史》专题课，得了80分的成绩。1951年侯先生到西北大学去做校长，想要把在北大听他课的学生带去，这可把张岂之高兴坏了。第一，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，西汉、唐两个盛世都在这里，文化古迹丰富，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好的城市；第二，西周就是在那里兴起的，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；第三，西北大学当时是国立西北大学，前身是西北联合大学，老师当校长，跟着他学，进步会挺大的。就这样，张岂之决心去西北大学。

甫去，侯先生就给了他讲师名义：“你在清华当过研究生，我不给你助教身份。”侯先生强调：讲课的人是讲师，不讲课的人不是讲师。就这样，张岂之的第一门课是给法律系调干生讲《逻辑学》。侯先生来听了他一堂课，说原理讲得可以，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，还需要继续努力。

张岂之对教学一向重视。从1952年到1978年，20多年他一直是讲师，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评为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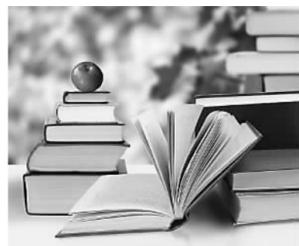
改革开放以后，张岂之担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，后来又当了副校长、校长。这都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不过当校长的时候，他依然没有放弃业

务，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《中国思想史》。学生们回忆说：张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时不看原稿，旁征博引，信手拈来，听起来非常过瘾。其实并不是张岂之的记性好，而是他重视课堂教学，准备充分，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来。

现在高校有重科研、轻教学的倾向，但在张岂之的记忆中，教他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。这对张岂之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。

在科研和编写教材之间，张岂之一直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。没有上级布置，没有申请课题，没有启动经费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下午，张岂之和几位同仁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归纳出若干原则，之后就开始了《中国思想史》的编写工作。这本由张岂之统稿主编的教材今天依然在大学里使用。2002年，张岂之又主编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《中国思想文化史》，历经4年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社会上一度出现贬低、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，这促使张岂之决心推出适合年轻人阅读的书籍。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拟出提纲，又邀请专家，主编了《中国传统文化》一书。该书于1994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此后又出了插图本和英译本，共印刷十多次，迄今不衰。张岂之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，2002年，他拟出15个专题，以“物质文明”“精神文明”“政治文明”“制度文明”为主线，邀请学术观点相近的专家写出了《中国历史十五讲》一书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销量很不错。作为侯外庐的学生和长期助手，侯外庐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，也有张岂之的一份贡献。

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，张岂之谦虚谨慎，他说，有生之年，在学术研究上要再做一些事，还有新的计划要实现。



“互联网+”带来的挑战很多，但机遇也无处不在。中国的图书市场足够大，能够容纳各种新媒体的存在。关键在哪？关键不在媒体上，而在于你能否给读者提供好的内容。只要拥有真正好的内容，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，无论是通过传统阅读还是数字化阅读，都会得到读者的追捧。

——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认为。

全国的话剧界都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剧本荒。目前写话剧剧本的人越来越少，国家话剧院现有的专业话剧编创大概是3到4位。电影电视剧剧本的创作对话剧的冲击还是蛮大的。

——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认为。

在信息的冲击和诱惑下，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没有关注本业。做学问的想着股票涨跌；做媒体的想做房地产和赚钱；做房地产的冲动着想做文化传播；当教师的开小差想办企业；办企业的懵懵懂懂要办学校……海量的信息和种种诱惑，冲击得人心浮躁，难以潜心于某一事某一物某一点，所以看似各行各业蓬勃朝气，却不出大师，难出成绩，难有突破！

——青年作家邢小俊认为。

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非常好，但是皮太厚。比如说一件古玩，如果搁在那里，我们并不认为好，你得说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艺术界的各个行种，绘画、音乐、戏剧，都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与当代化的体现。

——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表示。

其实人性无所谓好和坏、善和恶，不用分那么清，因为你也不分那么清。人性就是一个集合体。所以我觉得最不科学的，或者我觉得最有用的，就是那种一元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。

——著名作家苏童认为。

“互联网+”让世界的舞台“更大了，也更近了”，中国的文化艺术可以借助互联网传播到世界各国去，反之亦然。“互联网+”将全世界连接起来，大家可以发挥无限的想象，可能会产生更好的作品、传播方式、营销形式等。

——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认为。

做艺术、文化的人要有一种赤子之心，还要有一种胸怀，即如桥下流水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比如我们拍电影，老想着拿奥斯卡、金球奖、戛纳大奖等，就做不好。而那些真正获奖的片子，都是创作者发自内心的，都是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的。

——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表示。

经典是一定会复排的，经典也是完全可以变化的，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的戏，或者我们自己排的一些戏，它也是变化了的。但是这种变化只是手法的变化，它的中心、主题、人物是不能随便变的，如果变了，就不是经典了。

——编剧何冀平谈经典复排。

（文艺润、崔乃文辑）



他是世界首位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，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。他就是中国登山名宿王富洲。7月18日，他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辞世，享年80岁。

海拔8844.43米的珠穆朗玛峰，世界第一高峰，神圣，高洁，藏语中意为“圣母”“女神”，无数登山探险家对它魂牵梦绕……1960年之前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多次从南坡成功登顶，但北坡还没有成功登顶的先例。曾在这里数次“折戟沉沙”的英国探险家得出结论：想从北坡攀登这座“连飞鸟也无法飞过”的山峰，“几乎是不可能的”。

1958年，拥有地质学背景的王富洲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，调入国家登山队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。1960年，国家体委决定由中国人单独组队，从北坡挑战珠峰。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中国登山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，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纪录。

创造纪录的背后，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。在距离顶峰还有50多米的高度时，攀过一米高的岩石，竟然需要半个多小时。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，王富洲严重冻伤，却一直负责整个队伍的物资运输和技术安全工作，并开始动员鼓舞其他队员克服困难，为国争光。

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，作为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击队长，王富洲与队员贡布（藏族）、屈银华、刘连满四人经过近19个小时的搏斗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。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，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地球之巅，为中国赢得了荣誉，为世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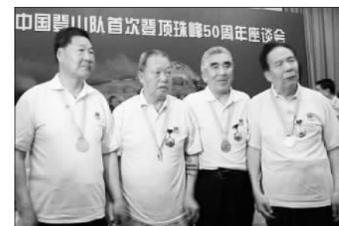
1964年，包括王富洲在内的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，实

王富洲 不朽登山魂

侯珂珂



1960年6月7日，（右起）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首次登顶珠峰凯旋时，受到热烈欢迎。



2010年5月31日，（右起）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参加纪念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座谈会合影。

现了人类首次登顶世界第十四高峰的壮举，并创造了一次10名队员集体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。1975年他随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征珠峰，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。这次集体登顶珠峰人数之多，科考成绩之大，在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，登山队配合测绘工作者第一次实地测绘了珠峰高度，被全世界普遍承认和采用。

尽管眼疾、手指截肢、高血压等伤病困扰着王富洲的晚年生活，但2008年，在北京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，他依然贴着电视屏幕看了奥运圣火登顶珠峰的全过程。王富洲当时这样感慨，“1960年，正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。我们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企盼，首次成功征服珠穆朗玛峰。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士气。登山和奥运精神一样，都是不断向上攀登，永远发扬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精神。”

7年前的话语犹在耳畔，这位登山名宿已将人性的光辉定格在高山之巅。对于老一代登山家的离世，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表示，尽管王富洲常年饱受脑血栓和听力、视力障碍的折磨，早年登山时被冻伤而截肢，但大家还是觉得王富洲走得太突然。李致新说：“他是中国登山界的开拓者，是我们的英雄。”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报道）